

目 录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对东江

地区革命的影响..... 古大存1

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方 方11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陆、惠、紫边区

的革命斗争..... 广东省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22

澎湃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几件事..... 林务农35

海、陆丰农民运动亲历记..... 余汉存54

一九二七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 黄 雍64

大革命时期的海丰农民自卫军..... 陈绍民71

澎湃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张云飞79

红二、四师进入海丰后的斗争..... 王克欧98

回忆红四师在海、陆丰的一些情况..... 朱道南104

海丰东南沿海的斗争..... 杨铁如107

在海南岛的革命洪流中..... 张开泰111

海南革命斗争亲历记..... 冯安全120

大革命时期的广宁县

农民运动史实纪要..... 陈昭华184

大革命时期顺德县农民运动概况..... 何秋如212

花县农民运动纪实..... 卢克文241

《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三辑至廿九辑分类总目录..... 259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对 东江地区革命的影响

古大存

一、第一、二次“左”倾路线的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东江的革命斗争是长期受“左”倾路线影响的，党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在历史上原有巨大功绩，但它助长了“左”倾情绪。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对东江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八七”会议正确决定的指导下，一九二七年爆发了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应该肯定，海陆丰苏维埃革命是正确的，它指明了人民革命的方向，鼓舞了广大地区工农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可是海陆丰苏维埃在巩固政权发展革命斗争方面带有“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表现在军事上强攻硬打，政治上树敌太多。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战胜敌人，而是单纯依靠武装来打敌人，形成军队孤立作战。红军二、四师在攻打敌人强固堡垒如果陇、南岭等地，受到很大损失。当时领导上没有足够重视到二、四师的每一个指战员都是革命的宝贵财产，而是只顾争夺一城一地，与敌人拚消耗。如果能够使红军二、四师密切与农民结合，广泛地发动农民，指导训练农民武装，包围敌据点，伺机歼灭敌人，那末，海陆丰周围各地的革命将出现一种崭新的局面，后来反“围剿”也

不致缺乏力量。

一九二八年春，海陆丰苏维埃革命失败后，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我们接受了这一严酷的教训，曾经在同年秋以后半年多的时间，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深入农民群众，做了很多工作，因而在一九二九年春开始，根据地和武装有了恢复和发展，建立了红军第十一军，辖揭（阳）、五（华）、丰（顺）、梅（县）、兴（宁）的四十六团，潮（阳）、普（宁）、惠（来）的四十七团，潮（安）、澄（海）、饶（平）的四十八团，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的四十九团，兴宁、寻邬的五十团，各县区还成立了赤卫常备队，可以说，一九二八年秋至一九二九年，党对东江革命运动的指导是正确的。

一九二九年冬，立三路线开始对东江发生影响，因为那时文件已经到达东江。一九三〇年初，特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林道文同志代表省委来传达的（林道文同志原来是东江特委书记，后上调省委），主要精神是贯彻总暴动路线，会议还制订了十八条纪律：凡不听命令，泄漏机密，……都要枪毙。

立三路线在东江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是：在组织路线上取消党的领导，以行动委员会领导一切；在军事路线上，提出集中攻坚。执行纪律，赏罚不明，十八条纪律如有违抗，条条都要枪毙，没有奖赏和鼓励；在思想上则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复仇思想。所有这些，都曾经给东江的革命斗争带来严重的损失。

当时东江方面立三路线的执行人是颜汉章，他是东江特委书记，又是东江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我虽为军长，实受行动委员会的指挥。在会上讨论集中攻坚的时候，我对此有异议，认为应该攻“要”，即攻打敌人要害的地方，不一定要找硬的打，但受到批评，说不敢攻坚是胆小鬼，逃跑主义。那时大家还没有体会到立

三路线的害处，不象今天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针可以衡量一切；那时没有什么文件，重要的文件只有《六大会议的决议案》、列宁的《暴动的艺术》，而且还是党内秘密传阅的，一切信件来往，阅后即马上烧毁。因此，那时党员的政策水平很低，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凭自己的直觉来处理问题。比如党员只知道无产阶级，农民、地主、军阀……等等，而遇到具体人和事就往往不懂得作阶级分析，从而也就没有明确的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策略思想；只知道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不怕牺牲，就是好党员。党内的这种状况，使立三路线在东江的推行，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

颜汉章书呆子气很浓厚，又有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当时很少下山，很少参加作战，只坐机关写字发命令，又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军事上一窍不通，所下的命令，都十分机械，如发命令时生硬规定某时出发，某时到达，某时开始战斗，某时战斗结束，没有随机应变的余地，这就给下面指挥员在执行上带来很大的困难。

当时提出集中攻坚的目标，是汕头和潮安。但是，那时驻大南山的我军，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而潮安方面敌人则有几团兵力，敌在潮安城内驻一个团，在湘子桥驻两个营，在枫溪驻二个团。我对打潮安抱不同意见，主张攻打丰顺，因为丰顺四面为我势力范围，拿下丰顺，扩大影响，军事政治上都有利，但这个主张受到批评。在错误路线的指挥下我军三打潮安，损失不少，并且挫伤了士气。集中攻坚口号之所以错误，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拿我们的主力去和敌人硬碰。我们的每个红军战士，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他们都是党的后备力量，和敌人硬碰，搞拚命主义，即使我们死一人，敌人死十人也不合算。在这个错误

的口号下，正确的东西得不到鼓励，而且要挨批评。如有一次我攻打丙村，消灭了敌人一个连，还被颜汉章批评“专找软的来打，可耻”！

集中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集中好，当时虽有很大的决心搞武装，但实际做起来又不坚决。颜汉章对集中的决心也不大，军部实际集中的力量只有一个团及一个营一个连。四十九团不肯调动，与颜的迁就、不严厉有关。四十九团三〇年夏到南山，实际上也不是为了集中。四十九团团长沙桂是很好的干部，但政委黄强的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不服从集中。五月间南山的林招战斗，完全是黄强的个人主义打起来的，实际上那一战是不应该打的，但是黄强为了显一显四十九团的声威，摆了一个阵势和张瑞贵一个师打硬战，还颁布了连坐法，一人逃走，其他受累，那一战虽然击退了敌人，我们也损失了不少骨干。

颜汉章是不是“AB团”，现在还弄不清楚。但是有一些问题值得怀疑。有一次他叫古宜权（四十六团团长）去打安流，安流是敌人一个坚固的据点，古宜权是很听命令的人，我怕他听了颜的命令而不根据实际情况来打，所以向颜提出由我去打。在安流打下后，颜汉章即派人带信给我，叫我马上到兴宁的双头去找他，说他们已经打下了双头，他已在双头等我。我在行近双头的途中，碰到农民，了解到敌人在双头驻了一团兵力。我回来质问他，他说宣称攻克双头是“鼓励士气”。

立三路线在东江苏区的实行，使党和武装力量受到损失，当时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至一九三〇年冬或一九三一年一、二月间立三路线才结束，但是代之而来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

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

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反立三路线的面孔出现的，但是比立三路线的影响更坏。在东江苏区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袁策夷。他在一九三一年春间来到东江传达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反对立三路线，但实际上是以“左”反“左”，故后来有人称它为“新立三路线”。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东江表现出来的特点，在组织上是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进行严重过火的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则是空喊口号，尽管当时只剩下很少兵力，还提出夺取大城市为目标；领导机关死守山上，写标语发口号，没有组织力量，推向平原活动，脱离了群众。

袁策夷担任东江特委书记，一次他以召开会议的名义，通知十一军的政治委员吴秉泰去特委，吴去后没有回，接着又叫我去，刚见面即对我说：“你来就好，我准备调你任军委参谋长，你现在去休息”，即叫警卫员送我到一個房子里把我关了起来。我初还不以为意，后来才知道是把我关押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上次吴秉泰没有回的原因可能被杀害了。我当时很气，叫守门的兵士给我开门，让我去见袁策夷，兵士说这是上头命令，他不敢开，我说：“由我负责，你尽管把门打开”。门打开后我即去找袁，质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要是共产党员的话，就不应该不问情由，把我关了；要是反革命的话，把我杀了，我也无话可说”。他表示：“你不要误会，不是这样的。”后来开了一个会，由颜汉章发言，说我是东江方面立三路线的执行人，由袁策夷宣布把我撤职，留党察看两个月。我反驳说：“颜汉章是东江行动委员

会的负责人，现在反说我是立三路线的代表，你们通知我来当参谋长，实际上是这样做法，这是不能肃清立三路线的。”袁说：“你还不服从处分，那就留党察看三个月”，还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还有什么意见呢，提了一句意见就多留一个月，还有什么意见可提？

第二天，即派我去陆惠边区，当时的陆惠县委书记是陈醒光，（这人是怕死鬼，后来叛变），我到陆惠边区的任务是恢复政权的工作。行前我问袁，要不要改一个名，他说：“怕什么呢，不用改名”，不改名也有个好处，到农民那里，我就不怕了。我去了后，群众听到我的名字，附近邻里到处都有人来找我，我叫大家组织起来，果然不到半个月，就恢复了政权，两个月后，搞了两个红军连，成立一个独立营，我任营长。这时陈醒光调走，袁通知我继任陆（丰）惠（来）县委书记，后来黄超如来接任陆惠县委书记，我被调回南山，担任东江游击第一路总指挥，卢督茂任第二路总指挥，但第一路总指挥实际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这个时期武装力量已受到严重损失。不久，组成一个大队，由中央调来的军事干部彭友初担任大队长。关于肃反问题，实际上“AB团”并不多。由于当时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造成草木皆兵，加上肃反政策错误，这一来便给敌人可乘之机，为敌人所利用，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AB团分子，借肃反为名，反诬许多革命干部为AB团分子，大肆屠杀，另方面我领导人员惊慌失措，对凡是可疑的人随便逮捕，实行“迫供讯”，未加调查研究，轻易处以枪杀，以致错杀了很多。被枪杀的人有的是与党内宗派主义斗争纠缠一起的，如吴秉泰是在反立三路线开始时秘密杀掉的，颜汉章后来也被杀了。

肃反问题的提出，是由于福建富田事件发生以后，由中央提

出的。肃反问题的提出是正确的，但在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把肃反扩大化则是错误的。这次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

“AB团”这个反革命组织为了迷惑、混蒙我们的耳目，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名目，如乌狗会、白扇会、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在根据地和游击区造谣、破坏、张贴反动标语、制造紧张、恐怖气氛。就我所知，陈回、李荣华（二人都任过共青团特委书记）和黄强等人，可以肯定是AB团的头子，AB团在我们内部特别注意在青年中活动，他们提出“拥护青年利益，青年要读书”！“拥护青年利益，青年要结婚”！“拥护青年利益，青年要娱乐”！等口号诱惑拉拢青年，破坏党群、干群关系。例如指使青年以开展体育运动为名，把农民的好田地辟为球场，造成农民对党和政府严重不满。

袁策夷同志后来对敌人的这种破坏活动有所感觉，开始对肃反中的一些问题有所怀疑。在我任政治保卫局长时，才查出了一些问题，经过清理，一次放出了九十多被押的人。这些人都是共青团员，从这些人中，我们摸出了陈回的活动情况。陈回在任团特委书记时，抓住团员的进步要求和幼稚无知等特点，个别问他们说：“你是不是想升党”，如果答想升党，就马上叫他们填表签字，然后带他们到一个无人的地方，说是开会，但实际没有开，只是几个人一起玩了一回，又带回来；过了十几天后，又说要开会，又如此玩耍一回带回来；如此经过三四次后，向大家宣布说：“你们已经参加了三、四次会议了，这是AB团的会，AB团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你们如果敢报告，共产党里有很多我们的人，会对你们怎么怎么的。”然后又宣传参加AB团干革命有保险，被敌人抓了也可以免杀，以及AB团的力量如何强大等等。总之，

极尽恐吓、诱惑、欺骗的能事。在青年被迫加入AB团后，即指使他们进行破坏活动，如破坏部队的给养，闹伙食不好，故意擦破衣服、鞋、袜，说：“鞋擦破可以换新的”等等。在这些问题的发觉了以后，陈回已经逃跑。

黄强是AB团里面最凶恶的一个。在我被调去陆惠边工作的期间，原红十一军改编为红军独立二师，彭桂是师长兼红一团（原四十九团）团长，黄强是师政委兼红一团政委，彭桂的服从性是很强的，这就给黄以为所欲为的机会，尤其是彭桂不在的期间，黄强借肃反为名，诬害无数革命干部为AB团，杀死了七百多名我党的骨干。黄强之所以当上反革命，是因为苏维埃失败后，黄曾一度跑到香港，由于他父亲与陈炯明有亲戚关系，和反动派搭上了线。在他回来重新参加队伍时，我们对他失去警惕性，让他窃据了部队的领导权，在我们搞肃反时，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后来，我们证实了黄强的反革命面目，即派彭桂同志从南山赶回海丰根据地，抓到黄强执行枪决。

我们在大南山，还杀过一个江西逃亡地主。这个逃亡地主是从中央苏区逃出来的，他跑到大南山，说要参加我们的部队，说他会车衣等，我把他布置到山口的一个小店里车衣，叫他经常给我们送情报，他所送的情报，有时也是准确的，有一次布置他到揭阳了解敌情，我随即派另一个人跟踪，他不去揭阳，却跑到汕头，和汕头的阔人一起在酒楼上喝酒。回来时我们向他要揭阳的情报，他随便编造一些假情况，等问题被揭穿，他才面如土色，追问结果是江西的一个逃亡地主，把他执行枪决了。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见反动派从革命内部进行破坏是猖狂的，他们所以能够如此猖狂，除由于我们缺乏政治警惕性被敌人打入内部这个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反立三路线时犯了

宗派主义过火斗争的错误，以及肃反过程中惊慌失措，乱捕乱杀，反立三路线和肃反又纠缠在一起，以致敌人有机可乘。由于这个原因杀了不少人，他们中有的应该是镇压的反革命分子，但有更多是蒙不白之冤的革命干部和红军战士。由于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有许多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便私自逃跑，脱离了革命队伍。革命势力遭到严重削弱，越来越没有力量反对强大的敌人反复进行的“围剿”，至一九三四年间东江苏区只剩下大南山一小块地方了。

袁策夷同志在一九三四年秋间调走，在他调走之前，我曾经向他提过，不要老是把部队放在山上，应组织到平原去开展游击活动。袁同意了此意见，在他将调走时，特委书记原安排我负责，我提出还是让我搞武装斗争，带队到平原活动，特委书记由李松山负责。领导上同意了这意见。在我下山后，约在一九三五年间，李松山带队到云落，整个特委机关为敌人全部抓去，李松山在那次叛变了，平原的党组织就全部为敌人所破坏。坚持斗争的十六个小队也为敌人消灭了；这十六个小队是被李松山一个一个的叫了出去，然后被消灭的。

在我下山以后，我头上长了一个肿瘤，非常严重，无法活动。这时李松山叛变的消息传来，十六个小队被敌人消灭，我在五华等地掩蔽了几个月后，于一九三五年冬，只得带队到大埔。我到大埔后病未愈，但还带着两个连熬了两年，好在那一带农村农民对我们都很好。一九三七年间，敌人知道了，派一团兵力来包围，但围不到我们（国民党的报纸也发表了这消息）。省委知道了这个消息，派饶彰风同志来找我们，但没有打听到。当时我们因和外面断绝联系，不知道整个形势的变化，传单上还是写着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直至一九三七年冬，我才化装出来香港，在香

港找到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这才和党取得了联系。

东江人民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自从一九三五年李松山叛变，大南山为中心的苏区被攻陷之后，基本上停止下来。东江苏区革命战争的失败的原因，除了敌强我弱这点应该肯定外，主观上则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政治、军事策略上的失误造成了革命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再则，没有很好的开展白区的工作，群众基础不够牢固，领导机关很庞大。后来实际上只剩下大南山的大石头了(南山是个石头山)，还在那里天天喊保卫苏区的口号，因此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实际上是处于孤立的状态。

三、关于根据地问题

东江根据地的成败，与以大南山为中心，还是以八乡山为中心也有很大关系，这个问题，特委在一九二九年和三〇年间，有过争论。当时我主张在八乡山，因为八乡山靠近中央苏区，它联系潮、揭、丰、兴、梅数县，地区广阔，可以和福建打通，而大南山不是一个大战场，一条云落公路如果被敌人切断，南山即成孤立之势；主张建立在大南山的同志则认为大南山群众基础好，给养方便，山形好、石洞多。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次争论中，特委起初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派我带了四十七团，打到江西寻鄔，途中我因敌人阻击受伤，折了回来。以后特委就改变了计划，把根据地建在南山，一直至东江失败。

曾文记录整理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

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方 方

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党内出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至使国民党右派有可乘之机，从广东出发的北伐战争打到长江流域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篡夺了革命领导权，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枪口刀刃转向革命群众，大革命陷于失败。潮汕地区的革命运动也转入低潮，广大工农重新喘息在封建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之下。

但是，石头压不住青草，血腥的屠杀，也吓不倒求解放的人们，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走了，但群众说：“同志呀！你们的炉子是有轮子的，到处能搞饭吃，可是我们的屋子却不能搬啊！”不斗争，任令烧杀抢掠，如何得了。群众对统治集团的憎恨，可由下述民歌看出：“甫母蒋介石，害民如落药，管着天就旱，勿甫伊就着。”（潮语）

到一九二七年六、七月的时候，党便有了“恢复组织，秘密活动，联系群众，向敌人反攻”的命令，不久又提出“发动群众，以赤色‘恐怖’来答复敌人的白色恐怖”。广东区委也派了原任汕头总工会秘书长、地委委员陈振韬同志到潮汕指导各县工作。

各地工作的恢复，主要在最穷、最苦、受压迫最厉害的“食乡”开始，而宗主乡（大乡、大族）则从小姓弱房开始，另一方面

是靠山的偏僻乡村。虽然还不懂得“乡村包围城市”，“搞三不管的地方”的理论，但其发展规律是一样的。在普宁来说，一区的八乡、二区的四十股、三区的白水礮一带，四区的六乡子、五区的汤坑子一带，六区的四乡、七区的大径肚一带，八区的大坪山脚、九区的铁山脚一带都是长期斗争的据点，不仅对地主阶级仇恨极深，且都是靠着山区，便于和敌人进行斗争。

以赤色‘恐怖’去答复白色恐怖，鼓起勇气，制止敌人的凶焰是对的，必要的。但运用的时候欠缺策略，形成大烧、大杀、大抢的盲目主义，不利于发动更广大群众，是严重的错误。尤其敌人采取了疯狂的烧杀抢掠来对付据点，利用了大乡大族的被欺骗群众，组织“布袋队”来协助其抢掠奸淫时，据点群众的斗争怒火又只好遏住，要求武装队伍不要住在他们乡里，以免受累。那句：“同志啊，你们的风炉是有车轮的，我们的房子是不能移动的”的老话又在新内容下喊出来了。（意思是敌人来了，你们会撤退，可是我们的房屋要受焚毁。）

当南昌起义军进到潮汕的时候，已是秋末了，时间虽然很短促就失败（进驻汕头为期只有七天，老百姓叫做七日红），但整个潮汕城乡都被工农革命军占领，普宁最反动的堡垒——县城和果陇乡都被攻下，群众的兴奋情绪异常高涨。可惜当时党的政策有错误，一、不发给群众武器、武装群众直接行动以肃杀豪绅地主；二、土地革命纲领不彻底，不符合实际（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三、政治面目不明确，还打着国民党党徽的旗帜（海丰老百姓说是白色恐怖的象征）。当然，军事上也有错误，而且孤军作战，敌人得以集结兵力来对付我们，而且由于我们占据时间短促来不及采取措施做好群众工作，终于使革命的部队在普宁流沙圩溃败。

在这期间，普宁党所能做的事情除协助保证负责同志——如周恩来、贺龙、郭沫若……等安全撤出战区外，最主要是收集散落在各地方的伤病员同志和武器弹药（潮汕各县也都是如此）。因此，贺、叶军虽然失败了，但我们东江地区却有了军事干部，增加了武器弹药。而且当时各地党的组织也都先后恢复了。因而，武装斗争便蓬勃地发展起来，并且打出土地革命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群众唱出：“甫甫甫，田仔甫田主，田仔耕田耕到死，田主在家吃白米。地是天生个，起来共伊产，工农兵团结，打倒反动派，有穿又有食，人人都爽快”（潮语）。展开对地主反动武装剧烈的斗争，基本上控制了全潮汕的广大乡村。我们的武装当时命名工农赤卫团，汕头澄海为第一团，潮阳为第二团，潮安为第三团，普宁为第×团……各团都有共产党员作党代表，方思琼当时就是第三团党代表。由于海陆丰及广州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革命的政治方向明确了，这给未来斗争指出了美丽的前途，增加了信心。及两地暴动失败后，队伍部分退到东江、潮汕，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师（袁国平——当时叫袁裕，是师长）。军事力量的加强，鼓舞了农民再度起来斗争，但可惜，当时党还没有斗争经验，一、不懂得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二、不懂得游击战争，只是强攻硬打；三、不懂得结合群众斗争，解决群众生活上的急迫要求，单纯军事行动，再加以敌人强大军事力量压迫，一直到是年（一九二七年）冬，斗争始终形成拉锯形势。一九二八年春，又因地委集中各县县委书记在汕头开会，被敌包围，结果省委巡视员为首的叶浩秀、地委书记陈振韬、市委陈国成，以及方临川、吴文兰等二十八人被捕，其中二十一人立即被敌枪决。同时党内又发生了方维精不服从领导，在潮汕组织三K党，与党对抗，部分武装又蜕化变成土匪（如张炳奎）；省

委巡视员沈青、徐克家二同志，又在揭阳五房山被敌袭击牺牲，各地农会干部被捉杀也很多，据点房屋多被烧光。于是群众斗争情绪逐渐低落，逃跑到南洋的人很多，许多大乡村的工作，被豪绅地主夺去，平原工作，大多转入秘密，武装都撤到山地，每县不过留存百数十人；且因连年苦战，住无定所，药物缺乏，以致患疟疾病的达百分之百。是年夏秋之间，斗争可以说几乎完全陷于休止状态，党的工作，只是开开会，教育党员，教育群众，坚持革命气节。

那年夏天，在彭湃同志领导下，惠、潮、梅党组织在南山召开代表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革命性质，会上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民权革命，有的说是土地革命，有的说是社会主义革命，彭湃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做结论，敌人已来包围，会议被冲散，因此，各人都抱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工作地去。

秋末，省委书记李源同志亲自到潮、梅指导工作，他指出：“第一次革命高潮已经过去，第二次革命高潮尚未到来，我们的斗争方式必须改变，不能再搅暴动、不能硬拚硬打，必须善于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作日常生活斗争，由最低级做起，揭露豪绅地主反动军官的罪行，加他们以符合实际的丑恶绰号，秘密夺取他们管辖地区的作物鱼牧牲畜，搞到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以壮群众的胆量，然后逐渐引导群众以年成不好为理由，提出要求减租减息，一直到抗租抗息的斗争。同时结合组织地下武装，待机行动。”这个指示对于武装斗争受到挫折以后，地下工作应如何做的问题，给予了具体的解决。各地都依这个指示耐心而艰苦的去接近群众，教育群众，领导各种各式的斗争，一点一滴地扩大党的影响，储蓄力量。慢慢地把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可惜的是，我们这位英勇而机智的工人阶级的儿子李源同志（海员工人，六

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到大埔巡视时，在三河坝与大埔县委书记邓凤翔同志同时被捕而牺牲了（当时省委有人说潮、梅真是“不毛之地”，去一个牺牲一个）。

我们在持续起伏的斗争中度过了一九二八年的冬季，工作是艰苦的，然而成绩也是伟大的。

为避免农民被敌人屠杀，工作人员和武装部队都是昼伏夜出，住的是破房烂屋、荒郊茅阴，任凭风吹雨打、半饿半饱，忍受着各种艰险去接近群众进行工作。善良的老太婆说，这些农会阿哥连官庙都不敢住（怕敌人搜索），生活比讨饭的都不如，每每坠泪劝我们的同志不要搞了，回家去吧。可是，每个信仰真理的共产党员、武装战士，都有一颗不可屈服的雄心，坚决斗到底，斗到死，每人不仅备有射击敌人的子弹，而且还备有在被包围不能脱险时准备自杀的最后的一粒子弹。很多同志，整年赤脚、单衣、睡地下，疾病死亡也不少——如方家悟、方书丹、方思忠……等同志就是在这情况下死去的。

由于工作深入，方法对头，整个农村除地主较多较大的乡里外，工作都恢复起来了，尤其由于武装长期在山区活动，各地加强了山区工作，使山区成为坚持斗争，敌人无法攻破的据点——如潮、普、惠之南山、潮、澄、饶的凤凰山、桑浦山、揭、五、丰之八乡山、梅、埔之铜鼓嶂……等，都是后来东江苏维埃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春，省委为着传达全国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在香港开办训练班，调动各县县级干部轮流去学习，课目有六大政治决议，农民问题，职工运动问题，游击战争及巷战问题。游击战争的课是聂荣臻同志负责的。尽管从今天看来，六大政治决议和其他文件有其缺点，一些且有错误（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估计），

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每个党员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革命性质、动力……等。有了理论武装起来的党，配合着广大群众的顽强斗争，工作又跳跃式的开展起来了。

至秋冬的时候，我们不仅成立了揭、五、丰、兴、梅之赤卫四十六团、潮、普、惠之赤卫第四十七团，潮、澄、饶之四十八团，海、陆丰之四十九团，兴宁、寻邬之五十团，而且每县有驳壳连（或独立连），每区有常备武装一班，各乡也普遍成立秘密的赤卫队，准备和敌人再作一次较量。

是年秋收，山地已完全抗租，有我队伍活动的地区，敌人也不敢下乡收租了。乡村的政权都掌握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农民协会手里，有的县并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与敌人的县政府对抗。普宁在是年秋于南山锡坑、三坑、大窝一带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李崇三、何石为正副主席。至于附城及大市镇地区，敌人仍不时出来“扫荡”，但我们已和群众打成一片，敌进乡村，我退田野，敌回据点，我继续工作。

一九三〇年清明前后，东江特委在八乡山召集代表会议，讨论暴动问题。

此时，地委书记是林道文，潮安县委书记杨少岳，潮阳县委书记李大林，揭阳县委书记张家骥，普宁县委书记方思琼，惠来县委书记陈醒光，梅县县委书记黄焕……；赤卫团的团长为阙光（后为李英）、李恩平、田时彦（后为陈开芹）、彭桂、刘光夏、还有特委常委古大存、杜式哲、颜汉章、林国英等。

此次会议，是在立三路线的思想指导下召开的，突出的问题是要促成惠、潮、梅总暴动，会上提出战术上要攻坚，当时有人说：应是攻“要”（即攻敌之要害），但受了批评。据说杜式哲在参加省委会议上就受到立三路线健将贺康骂一顿而哭着回来的。